

HUIGU YU XINTAN
ZHONGGUO
XIANDAISHI
YANJIU
QIANYAN WENT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回顾与新探

——『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郭德宏 吴宏亮



郑州大学出版社

HUIGU YU XINTAN
ZHONGGUO
XIANDAISHI
YANJIU
QIANYAN WENT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回顾与新探

『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郭德宏 吴宏亮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顾与新探——“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郭德宏,吴宏亮主编.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645-0636-0

I. ①回… II. ①郭…②吴… III. ①现代史-中国-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6020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30.5

字数:634 千字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0636-0

定价:6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2010年10月16-17日,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和社科研究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亲历了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并围绕"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本次会议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结束后,我们分别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研究员、南开大学李少兵教授、郑州大学谢晓鹏副教授,从会议收到的70余篇论文中,精选出一些质量较好的论文进行比较、筛选,初步确定了39篇论文,拟编成会议论文集。随后,我们又委托谢晓鹏拟定了一个《关于论文集的编辑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拟收入论文集的论文作者,请作者严格按照要求修改、完善、提交论文。最终有6位作者的论文没有按时发来,我们就将33篇精选出的会议论文编成了现在的论文集。其中陈廷湘教授原提交会议的《"九一八"事变初学生反日运动的潮起潮落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因已在学术期刊发表,本人提出将其换为《中国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一文,我们最后同意。对于没有收入论文集的那些论文的作者,我们谨表歉意。

该论文集根据收录的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研究回顾与前瞻;二、政治与军事问题研究;三、其他专题研究。此外,谢晓鹏撰

写的会议综述放在论文集的前面,以便大家对这次会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论文集的主要特点是:一、选题广泛,内容丰富。收录的论文既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思考和研究综述,也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题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二、异彩纷呈,新论迭出。收录的论文中既有知名专家的大作,也有学术新锐的佳作,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学术前沿。

在编辑本论文集的过程中,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卢帅、张楠、王婕、廖金城、贾迪、邢小辅等人积极协助工作,从而保证了论文集的按时编就。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集涉及的作者较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联系多有不便。我们虽制定了统一的编辑要求,但仍有一些作者没有严格按要求提交论文。特别是论文注释存在格式不一、要素不全、信息不准等问题,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有些问题最终也难以解决。这次我们在编辑时,主要对论文格式、字体、字号等进行了统一编校;而对论文的内容、引文、注释、标点,除了明显错误处予以纠正外,本着忠实于历史本来面貌(特别是引文和注释)和作者原作的原则,一般不予改动,以方便读者检索。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论文集虽经过了反复的编校工作,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能够谅解,也希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郭德宏 吴宏亮

2011年10月

目 录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晓鹏(1)
-----------------------------------	---------

研究回顾与前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东北移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范立君(13)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曲广华 刘 喆(25)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谭玉秀(35)
李大钊研究前沿及有关问题	◆张同乐(55)
关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以东固苏区史研究为例	◆游海华 张兆金(6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的前沿问题	◆范德伟(75)
近现代中国的协商政治:研究状况、历史线索与逻辑举要	◆王 智(84)
近 10 年来多党合作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	◆李 媛(92)
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回顾与前瞻	◆吴宏亮 黄天弘(113)
中国改革开放史若干前沿问题研究述评	◆沈传亮(135)

政治与军事问题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王兆刚(149)
“西湖会议”和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	◆杨振亚(164)
也谈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	
——以中山舰事件为例	◆朱 华(176)
政府权威与民众利益	
——论国民党政府对三友实业社停厂纠纷的调处	◆彭贵珍(186)
第五次“围剿”中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黄道炫(199)
曾山的领导艺术及意义	◆黄惠运(213)

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郭德宏(229)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及其特点	◆袁文伟(237)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论析	◆洪小夏(249)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与思考	◆闻黎明(263)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关系述论	◆党彦虹(285)
苏联与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起步	◆储峰 赵威(293)

其他专题研究

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教育*	◆汪谦千(313)
制度软实力与近代社会发展	◆陈先初(329)
中国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陈廷湘(339)
铁路与郑州城市的兴起:1905—1937年	◆刘晖(365)
行政中心城市现代化道路探讨 ——以南京为个案的研究(1912—1937年)	◆侯风云(381)
王光祈与《每周评论》	◆赵崇华(394)
杨杏佛科学救国思想论	◆朱华(404)
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左玉河(414)
战后初期台湾统制经济的制度分析	◆潘健(436)
关于对“无毒中国”的再思考	◆胡金野 齐磊 韩敬梓(447)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从文化革命模式到文化生产力模式	◆谭献民 王军(466)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 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晓鹏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于 1980 年在郑州成立,至今已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2010 年 10 月 16—17 日,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和社科研究机构的 120 余位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围绕“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吴宏亮教授主持。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致开幕词,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致欢迎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副局长明立志、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谦进到会讲话。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云涛宣读了中国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和党史教研部、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致大会的贺信。特邀代表、学会第一任秘书长蒋相炎教授、副秘书长陈善学教授到会发言。会议期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陈铁健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左玉河研究员先后作学术报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教授、上海师大法政学院洪小夏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沈传亮副教授、青海民族大学孙欲声教授、安庆市委党史办李银德副编审、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永福教授先后作大会发言。会议按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文化进行了分组讨论。大会闭幕式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兵教授点评了会议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教授代表会议承办方发表了讲话。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柳建辉教授致闭幕词。

现根据收到的会议论文及大会报告、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内容,拟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对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情况作一综述。

一、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思考与研究述评

近年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步平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并就该研究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影响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强调,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我们既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感情,但也不能迎合民众的感情,学术问题不能政治化、情绪化。同时,随着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应当有一种大国心态,历史认识也要跨越国境。

史学研究是否一定要有某种理论来指导,陈铁健的学术报告结合陈独秀研究和瞿秋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历史信息。他认为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存留,但是要有充满活力的思想,如果思想被冻结为理论,那么很可能产生理论霸权和理论教条来妨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首要的任务是把历史搞清楚,把历史真相揭示出来,不要过早地进行理论的判断,总结所谓的历史规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代史学科也面临着体系更新问题。张宪文的学术报告《中国现代史的体系问题》主要谈了六个问题:(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问题;(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思路和主线问题;(三)重新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和不同的改造中国道路的问题;(四)关于辛亥革命问题;(五)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六)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应该扩大视野,运用民族史观、人民史观、国家史观等来全面反映各民族、各阶级的共同活动和追求。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畏艰难,这是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我们历史的主线。他强调,国共两党在改造和建设中国的道路上都取得了成就,他们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方法分歧不能简单地写成革命与反革命,中国现代史学科要实现改革从而促进学科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他还强调要坚持历史研究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原则,要处理好历史情感、学术真实和为现实服务的关系。

抗日战争史多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郭德宏在《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应该进一步研究和加以重视的九个方面:(一)应首先把基本事实研究清楚;(二)应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三)应加强对台、港、澳和沦陷区抗战史的研究;(四)应重视中间势力在抗战中的作用;(五)应加强对普通群众、战士在抗战中英勇事迹的研究;(六)应加强抗战时期思想文化教育的研究;(七)希望国共两党、海

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编写抗日战争史;(八)应重视国外及中国台湾资料的搜集和交流;(九)应重视民间的研究力量。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发展迅速。韩钢在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特点》的大会报告中,概括了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五个特点:(一)地方档案的大量运用;(二)民间史料的挖掘;(三)重视实证研究;(四)个案研究显示出生命力;(五)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建构知识而不是建构体系。

一些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研究状况关注较多。王智的《近现代中国的协商政治:研究状况、历史线索与逻辑举要》一文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协商政治,基于中国“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区别于当代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民主”或“协商政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近90年来政治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目前,国内关于协商政治、协商民主问题的研究已呈方兴未艾之势。厘清中国协商政治生长逻辑的关键在于,要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非均衡的政治生态和持续升级的革命话语中进行源流把握。民主革命时期协商政治观察的核心在于革命语境下的党派和解与政治宽容;1949年以后则可以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换过程为依据,来考察协商政治“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脉络。李瑗的《近10年来多党合作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一文,主要介绍了近10年来多党合作研究的概况与特点及前沿热点问题,并就今后的研究走向提出了五点建议:(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二)重大的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三)研究内容和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宽;(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多样化;(五)研究的价值取向有待进一步明确。吴宏亮、黄天弘的《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以我国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为考察对象,从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方法创新、存在问题与前瞻四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总结。文章建言,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多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网络民主研究;要立足中国的研究实际,形成多元化、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陈述的《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及述评》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及评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史中若干争论问题,诸如新时期历史的阶段划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1983年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次大争论”、中国改革方式争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代主题问题、新阶层的争论、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等。文章指出,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研究本然的东西多一点,研究所以然的作品较少,所以得到公认的成果还不多。沈传亮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若干前沿问题研究

述评》一文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区域。其中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有改革开放的缘起、历史主线、阶段划分、思想交锋等问题。关于改革开放史的理论问题,还有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如何全面评价改革开放史上的人物,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此外,张同乐的《李大钊研究前沿及有关问题》,游海华、张兆金的《关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几点看法——以东固苏区史为例》,范德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的前沿问题》,劳开准的《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研究》,张绪雄的《七千人大会研究述评》,武艳敏的《50年来民国救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范立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北移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曲广华、刘喆的《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研究现状与展望》,谭玉秀的《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等论文,分别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研究动态的了解。

二、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军事问题的研究

本次会议收到的有关中国近现代政治问题的论文较多,除了上述几篇涉及政治问题的研究述评之外,尚有19篇此类文章。其中关于中共及其人物的有10篇,关于国民党及其相关人物的有5篇,关于其他主题的有4篇。

丁晓平的《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考述》一文,通过对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三种不同译本的异同比较,着重考述了新发现的翻译手稿的文献价值,并对该文献不同译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杨振亚的《“西湖会议”和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一文指出,“西湖会议”是国共两党首次合作中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有条件地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可是,中共接受这种形式并不顺利,有过一个曲折过程,而且国共两党在对“党内合作”的认识上具有不同的理解。黄正林的《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一文,通过对红26军历史的考察,发现有多种因素造成了1935年这次肃反。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把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来陕甘边和红26军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则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郭德宏在《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一文中认为,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第一,他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第二,他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因此,不能因为王明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在

抗战初期什么都是错的。更不能不顾全文,只挑出一些所谓错误的语句,来批判王明的错误。还有几篇论文分别对中共“五大”、中共的执政方式、1957年的整风运动,以及邓小平、乌兰夫、曾山等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探讨。

对于国民党及其相关人物与事件的研究引人瞩目。蒋介石日记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它的价值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沪)朱华的《也谈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以中山舰事件为例》一文,通过对蒋氏中山舰事件期间日记不同版本的比较,探讨了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他认为,蒋介石长期惯于在日记中装腔作势,“以言为行”,致使其后来有些日记所展示的“内心世界”已经虚伪到了怪诞的程度。彭贵珍的《政府权威与民众利益——论国民党政府对三友实业社停厂纠纷的调处》一文,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停厂纠纷进行了重新梳理,着重考察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对该案的处理,探讨了国民党政府调处劳资争议的目的、执行劳资政策的态度以及劳资争议调处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在以往学界的研究中,国防最高委员会被认为是国民党在战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彦虹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关系述论》一文则认为,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代行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仍在发挥作用,在机构设置上,国防最高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决议案需呈请中常会备案;在战时特殊体制下,二者又共同对总裁负责,对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促进国民党内各部门有效运转及集中力量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陈廷湘的《“九一八”事变初学生反日运动的潮起潮落及其影响因素》一文,深入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初学生的反日运动,指出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反日学生运动启动迅猛,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后很快结束。这次学潮规模巨大、行动激烈,对当局的冲击程度超过以往的学生运动。但此次学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未与工农商各界相结合而形成持久的运动,最后在国民党当局的化解政策和众多因素影响下而归于平息。闻黎明的《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与思考》一文,以西南联大为考察对象,对该校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史学界所忽略的动员方式、从军意识、思考重点、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进而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与建国关系上的思考与实践。此外,刘明钢的《评吴佩孚复汪精卫函》一文,深入解读了1939年6月7日吴佩孚复汪精卫函;闫朦的《抗日战争初期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始末》一文,比较系统地探究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过程、主要活动和最终结局;王兆刚的《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对近代中国三种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梳理。

本次会议还收到8篇有关中国近现代军事问题的论文,其中颇有新意的是黄道炫、洪小夏、储峰等人的论文。黄道炫的《第五次“围剿”中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文指出,蒋介石采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对“围剿”的最终走向发

挥了一定作用,第五次“围剿”的最终成功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印象。但究其实,这一政策真正效果实属有限,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成功主要还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由此政策而来。洪小夏的《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论析》一文,分时段对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八年抗战中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了全面梳理,并对其特点、发展过程和衰败原因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储峰、赵威的《苏联与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起步》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购买苏联武器装备、聘请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帮助军事院校建设和训练军事人才、引进苏联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学习借鉴苏联军队编制体制和条令条例等方式和途径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其他相关论文还有:潘洵的《略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袁文伟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及其特点》,储峰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其影响——兼谈中国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争论和曲折》,严鸿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空军建设的推动》等。

三、对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除了前述几篇研究述评类文章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外,本次会议还收到13篇探讨此类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关于城市史研究的有2篇。刘晖的《铁路与郑州城市的兴起:1905—1937年》一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1905至1937年间的郑州如何凭借铁路助力实现了工商业初兴、交通运输业繁荣、城市人口增长及城市空间拓展,从微观层面上对铁路与近代郑州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探讨。侯风云的《行政中心城市现代化道路探讨——以南京为个案的研究(1912—1937年)》一文指出,近代南京主要是在传统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得益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凭借政治和政府力量参与城市建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制约了它的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研究的论文有3篇。李丽娜的《铁路与山西区域经济近代化进程:1907—1937年》一文指出,近代铁路通行后,巨大的运输能力及优越的运输性能极大地推动山西区域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集中表现在晋南棉粮农产区的发展、晋中工商业区的嬗变、晋东矿产区的崛起及晋北矿农畜业混合区的演变上。这一变动充分体现了铁路与山西经济近代化的紧密联系,并进一步预示着近代山西经济的发展轨迹,影响着其历史变迁。刘义程的《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工业发展考察》一文指出,抗战期间,由于江西所处的战时地位和特殊的社会环境,加上地方政府有计划的领导和推动、民间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使得江西工业在抗战初中期出现了前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然而,到了抗战后期,随着日军扩大在江西的战争,盛极一时的江西工业遭受重大打击,呈现急剧衰落之势。潘健的《战后初期台湾统制经济的制度分析》一文,从经济角度入手,分析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剖析了国民政府在台湾收复初期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失败的原因。

关于社会群体研究的论文有2篇。谢从高的《20世纪20年代军人社会形象——以〈晨报〉、〈申报〉为中心》一文指出,20世纪20年代,武人政治突出。由于军人首领干政以及普通军人军纪败坏,军人形象不佳。军人形象的改变需要像新军首义建立民国和黄埔军校学生军的组建这些关键结点,更需要所有军人自身行为检点。李庆刚的《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身份析论》一文指出,开明士绅这一历史群体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特殊的中间势力。这一群体可分为普通开明士绅和著名开明士绅两部分,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出对这一群体的全面认识。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篇。陶水木的《浙江壬戌水灾述论》一文,比较全面深入地考察了1922年(壬戌)夏秋浙江所遭受的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并分析了导致这场水灾的诸多原因。李少兵的《教育救济:20世纪上半叶京津妇女慈善事业的转型》一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北京、天津的传统妇女慈善事业开始向现代转型,教育救济成为新型妇女慈济活动。这种救济模式力图通过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妇女的境遇,使其未来不仅能自食其力,而且可以参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的负担转变为社会进步的助力。胡金野、齐磊、韩敬梓的《关于对“无毒中国”的再思考》一文认为,对新中国建立之初“无毒中国”的美誉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无毒中国”的含义;其次,“无毒中国”的含义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毒品问题已完全或绝对不存在;再次,个别地区毒品问题的长期存在,形成了一股股暗流,成为当代中国毒品问题重新兴起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内在因素。

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论文有3篇。陈先初的《制度软实力与近代社会发展》一文认为,软实力并不仅仅体现于文化层面,它还体现于制度层面,由制度构成的软实力甚至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软实力。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中吸取智慧,通过进一步提升制度软实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王盛泽的《从历史角度解读社会发展动力》一文,以及张鸣年的《从建国以来苏南农民对农村发展的贡献看历史发展主体》一文,则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和历史发展主体问题。

四、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教育等问题的研究

本次会议收到的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教育等问题的论文有10余篇,涉及面较广。其中对中共思想文化的关注较多,涉及民粹主义、苏区文化、民族精神、解放思想、文化模式等内容。

左玉河为本次会议提交了论文《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并在大会上作了同题的学术报告。他在论文和报告中指出,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粹主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极力克服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

陈始发的《试论中央苏区文化对五四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文,首先对五四文化传统进行了概要性提炼;接着重点考察了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对于五四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从民主观的改造到新型民主的建构、从捍卫科学的价值观到培养科学精神与普及科学知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倡导妇女解放到解放妇女”;最后分析了中央苏区文化的建设性、先进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及时代价值。

谭献民、王军的《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从文化革命模式到文化生产力模式》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前后两种发展模式和运行状态:文化革命模式和文化生产力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30年属于文化革命模式,这种模式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延续和探索,文化的任务是以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来巩固政权、解决温饱和维护社会稳定,所以知识分子的价值从经济、政治的建设和改革中得以实现和体现。其后的30年则逐渐进入到文化生产力模式时期,这种模式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逐渐发展并形成的,文化的生产力特性逐渐显现,并改变了其附庸和隶属地位,在市场中的决定性和创造性作用逐渐凸显,知识分子以其“个性”、“创意”和“创新”独立实现自我价值。

此外,刘文华、戴光权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及其历史意义》,张棣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汪晓红的《广东改革开放30年解放思

想的历程和深度》等论文,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共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探讨。赵崇华的《王光祈与〈每周评论〉》,(川)朱华的《杨杏佛科学救国思想论》,戴美政的《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及其旧址》,徐新玲的《1960至1962年〈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特点分析》,汪谦干的《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教育》,赵可的《民国时期兵工学校的办学特色及现实启示》、徐国利的《浅谈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等论文,则分别涉及文化人物、新闻传媒、教育、学术等问题。这些论文在观察问题的角度、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学术观点的凝练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是围绕“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进行的学术研讨,都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这将对中国现代史学会的今后发展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不断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柳建辉教授对本次会议的评价:“这次会议成为近年来我们中国现代史学会召开的一次相对来说规模最大、收获也最多的学界盛会。”“会议组织紧凑、主题集中、内容丰富,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是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的活动进行得圆满,从会议的讲话、发言,到会议所发的材料及会场的气氛和文艺演出等方面,大家都能感受到;二是会议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开展得也比较深入和广泛,从会议的专题发言到分组讨论,以及入选的论文来看,大家也能感受到。可以说这既是一次圆满的纪念会,又是一次圆满的学术研讨会。”不过,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这次会议的研讨主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但从收到的70余篇论文来看,真正体现这一研讨主题的不够多。相比之下,这次会议倒是收到了不少学术史回顾和研究述评类文章,此类文章一般重于对过去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而疏于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这大概是一些学者对“学术前沿”理解有误所致。关于“学术前沿”,根据南开大学李少兵教授在会议闭幕式上点评会议论文时的观点,它一般有三个标准:一是跟欧美、日本和港台地区接轨,二是提出新的学术问题,三是旧瓶装新酒。但令人遗憾的是,符合这三个标准的会议论文并不多。另外,从整体上看,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虽数量较多、选题广泛、内容丰富,但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高水平的、真正探讨学术前沿问题的有,缺乏学术价值、临时拼凑的也有,还有个别文章只能算是政论文章或宣教文章,称不上学术论文。这一状况有待中国现代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加以改进,会议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中国现代史学会以后能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加以解决。

